

教化还是启蒙：中国成长小说的兴衰与意识形态

沈宏芬

概括来说，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主要是描写一个年轻人从童年或者青少年进入成年的经历，其间，他离开家庭，进入到广阔的世界，并经历爱情的失败和事业的追求，最终在这一经验中获得对自我与社会的认知，从而完成他的成长过程。对于成长小说来说，其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个体要求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对个体的发展方向，也即他的归宿，有着一定的要求。因而个体和社会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而怎样化解这个矛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所开辟，在这里，个体从经验中获得认知，并逐渐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是不切实际的，而接受社会的规范，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论他先前经历了多少痛苦和迷误，现在都可以对自己说，无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都能在其中生活了，而另一种则是个体保持自己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可能在根本上与社会是冲突的，因而最终走向一种“失败的”成长，没有与世界达成和解。前一种形态主要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盛行，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开始，后一种形态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获得了优先之势。传统的成长小说定义，如果从狄尔泰对成长小说乐观结尾的维度来看，主要指的是前一种形态，也即从社会规约角度来看个体成长的完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瑞蒂 (Franco Moretti,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认为成长小说在现代主义兴起时就走向了终结。当然这种以社会规约为主要导向的成长故事，并不总是令人向往的。黑格尔在《美学》中就不无讽刺地说到这种成长的结果不过是堕入日常生活的庸常而失去个性。1970年代左右对成长小说的结尾之争乃至对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的合法性的质疑，根本出发点，还是在“社会规约”之于个体成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成长小说之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书写，主要是通过一个个体是否能获得“完整性”，来讨论社会建构的方向问题。成长小说所描写的个体，不是作为私人的个体，而是作为“公共的人”而出现的。他是作为构成社会的每个基本因子，也就是每个个体的代表而言的。他所发展的方向，比如他作为“完人”的形象，直接指向了作者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因而成长小说可以说包含两头：一头是个人启蒙，一头是社会的乌托邦指向，而连接其中则是教育。这里就不仅涉及到成长小说所书写的个人启蒙实际上是存在于一个大的人文精神的大语境中，而且还涵盖了成长小说的美学政治维度，成长小说从来就不是作为纯文学而获得重要地位，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它对共同民族文化建构的参与，而其中“教育”则是实现从个体到社会的桥梁。教育 (Education) 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去教育、启蒙 (to educate) 个体，一是教化 (to cultivate)，后者在米尔 (Mill)、帕特 (Pater) 和阿诺德 (Arnold) 等的理念中直接通向文化 (culture)¹。

本文主要是在上述理论视域中，来讨论意识形态维度下中国成长小说的发展形态。中国成长小说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大阶段：1920-40年代、1950年代至文革结束、1989年至当下。

一、被压抑的启蒙

对中国文学界来说，成长小说是一个舶来品。在二十世纪初期译介外国小说

¹ 关于“教化”和“文化”的论述，可参看 *Jeffers T. L. Apprenticeships: The Bildungsroman from Goethe to Santayana*. New York, 2005, p. 45-48.

的大潮中，成长小说的概念被引进中国。首先，它是以“教育小说”的名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教育小说”的兴盛，主要是应和了当时新式教育的勃兴这一现象。在“教育小说”的名义下，产生了一批半译半作的小说，其中最畅销的是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与《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此时的“教育小说”很难说是成熟的成长小说文本，而主要是借助一些新的教育理念，来看儿童的教育问题，但它们为成长小说的诞生起到了铺垫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是从市场和读者方面来看。1928年对中国成长小说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年，叶圣陶受《教育杂志》邀请，写一篇和教育有关的“教育文艺”，这样就诞生了《倪焕之》。《倪焕之》的发表可以作为中国成长小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就在同一年，茅盾的另一重要作品《虹》也发表了。

《倪焕之》和《虹》处理的是同一问题：五四启蒙精神感召下的个体如何处理自身的启蒙理念与革命的关系。《倪焕之》追踪了主人公倪焕之成长的三大阶段，也是主人公持不同理想的三大阶段。首先，倪焕之被聘请到一所中学区任教，在这里他碰见了一个开明的校长，并爱上了一个与自己有着相同信念的年轻女性金佩章，但此时对倪焕之最重要的事，还是他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活动。倪焕之开辟了一个农场，引导学生在这里种植农作物、关注植物的生成过程，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来教导学生做一个有意义的人。从倪焕之的这种有机的人文教育理念，我们可以看到洪堡、歌德的影子。但是倪焕之很快遭遇到了失败。他的学生无法理解他的初衷，只觉得在农场种植无聊又没有意义。倪焕之投入了第二个理想：小家庭幸福。他与金佩章走了五四启蒙青年向往的自由恋爱模式，并顺利进入婚姻。但倪焕之发现，这种小家庭只让他失掉了理想气息，而堕入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常中。出于对家庭生活的失望，他投入到上海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但此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发生了第一次围剿（影射大革命），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倪焕之在最后的希望破灭后，落寞死去。小说《倪焕之》交代了倪焕之成长过程中三大理想的失败，前两个理想，实际上都讲的是五四启蒙精神，而后一个理想则是革命。小说中没有交代启蒙和革命的对比，而是将倪焕之成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作者叶圣陶这一代人在1920年代末期所处的现实处境。这一时期，五四启蒙已经落潮，很多青年刚开始从启蒙投入革命，试图将后者作为最后的希望。然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国共两党合作破灭，革命面临最大的危机。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广大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了迷茫和失落。这正是小说中倪焕之理想都失败并且还出现了革命失败这一场景的来源。但是1927年的革命危机非但没有让革命走向低潮，反而促使了革命的勃兴。正是在这一低潮的情势中，“革命文学”迅速崛起，取代“文学革命”，成为新晋力量。成仿吾等人尖锐地批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认为它是落后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实际上正是五四启蒙下个人觉醒的产物。茅盾随之发表了《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系列文章来辩护。这场自1920年代中期持续到1930年代的论争，是革命文学和启蒙文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倪焕之》就是这场交锋在文学上的代表。倪焕之的成长失败，本质上而言，是启蒙面对革命的失败。当倪焕之倒下之际，一类新的主人公——革命青年正准备取代他的位置，成为历史发展的新动力。茅盾不无沉痛地坦言：“现在是整整十年了！‘五四’的壮潮所产生的一些‘风云儿’，也早已历尽了多么多少变幻！沿着‘五四’的潮流而起，又跟着‘五四’的潮流而下的那一班人，固不用说；便是当时的卓然的‘中坚’却也很令人兴感。病死的，殉难的，退休的，没落的，反动的，停滞的，形形色色，都在历史先生的跟前暴露了本相了。时代的轮子，毫无怜悯地碾毙了那些软脊骨的！只有脚力健者能够跟得上，然而大半还不是成了 Outcast！”[茅盾 1929] 茅盾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时代性。茅盾对《倪焕之》的时代性的陈述，点名了启蒙这个注重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理想，已变得不合时宜。他的陈述也可以作为中国成长小说在这一阶段的特征的总结。

1940年代当冯至最终用“成长小说”的命名来翻译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时，这个文类已经在文坛引不起任何反应。而在此之前，苏雪林的《棘心》(1929)、郁如的《遥远的爱》(1944)和骆宾基的《混沌初开》(1944-6)发表。这些小说奖叙述的中心转到了个人体验和成长细节上，在文类层面来看，是较为成熟的成长小说，但无一不受到冷遇。

作为启蒙出场的中国成长小说，第一次面临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它的抛弃。李泽厚将“启蒙”和“革命”的论争当作中国现代性的核心。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这里以单一发展倾向，很快放弃了容纳多样性和具体性的启蒙维度，将个体塑形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二、作为国家想象的成长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自此新国家集体认同的建立，成为党的第一要义。随后的1950年代，原先备受冷落的成长小说突然一跃成为创作的主流。这场延续到文革结束的成长小说创作热情，是中国成长小说历史阶段的第一次高潮，实际上也是唯一一次。自1950年代至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成长小说第一次被官方意识形态“选为”新民族文化建构的文学形式。

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成长小说而不是别的文类被选为国家想象的新武器？我们知道，从晚清开始到1949年之前，流行的小说类型主要有狭侠小说、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也就是说它们主要是以市民消遣、讽刺谴责、未来想象为主²。市民消遣类的小说起到了扩大读者群的作用，而其他类型的小说则展开了尖锐的社会、政治、历史批判。后一类小说在1949年之前，起到了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力量。但是新的国家成立，社会批判力量所蕴含的巨大革命性作用，使得它对新成立的政府和国家也同样具备威胁。现在新国家需要的，已经不是破坏性的批判力量，而是怎样去建立集体国家认同。正是在这种形式下，成长小说登上了历史舞台。成长小说讲的就是青年个体的塑形这一主题。而青年，早在1920年代，就被毛泽东看成是新的革命力量，是主宰未来社会形态的关键力量。因而如何塑造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就关乎国家的凝聚力和未来发展方向。

1950年代诞生了一大批成长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青春之歌》。这部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整个社会长达一年的关于它的讨论。《青春之歌》设置了一个基本模式：主人公林道静的父亲是旧社会的剥削阶级——地主，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丫鬟，在被林道静的父亲强暴后生下林道静并死去。剥削阶级与被侮辱、被损害的阶级的对比，将旧社会的最关键矛盾呈现了出来。而林道静的成长，就是要反抗旧社会的压迫模式。林道静离家出走后，先后与一个胡适式的知识分子和一个共产党员相爱，当然后者赢得了林的爱情。最后林道静在群众运动中，感受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个洪流，彻底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清除了。成长至此结束。林道静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新、旧社会力量对她进行争夺的象征。新的社会战胜了，并提供给主人公一个新的未来——这个未来在今天看来正是丧失个体性的，但是新国家建立的要求，正是要破除个体性，个体性被看成是落后无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到了文革期间，林道静开启的这种成长塑形走向了极端。同样是由家庭设置出发：主人公出生在一个半小资产阶级、半革命的家庭，一般是父亲作为知识分子，而母亲作为革命者出现，小资产阶级的血统使得他有需要被改造的要求，革命性保证了改造的成功性。从此改造就成为主人公成长的唯一任务。相较于1950年代的成长小说，文革期间的成长小说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家庭出生的设置从新、旧社会的矛盾，变成了新社会内两种力量——进步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矛盾。其次，主人公的改造过程，虽然都是剥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路径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林道静的改造是通过爱情为象征，表明了两种外部力量对她的争夺，而文革期间的文本的主人公们，一是完全放弃了爱情这一维度，主人公一般是作为无性别的人

² 这里对流行的小说类型的分类，参考了阿英、陈平原、王德威的相关论述。

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将改造内向化了，由外部力量对个体的争夺，变成个体对自身血统的剥除。最后，成长结果的高度形式化——高大全形象的设置，将林道静成长尚有的具体性和多样性扫除了，使个体的主体性丧失殆尽，完全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里可以看到官方意识形态对个体塑形的要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也发生了变化，并且在控制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

三、新启蒙的离心叙事与参与

1989年，《玫瑰门》诞生。这部作品的发表意味着中国成长小说走上复兴的道路。在这一阶段，盛行的成长小说主要有四类：后文革成长小说、乌托邦成长小说、女性成长小说、青春成长小说。后文革成长小说指的是1989年之后由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早期生作家写的反思文革的文本，代表作有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东西的《耳光响亮》等作品。乌托邦成长小说主要是指将主人公的成长放在一个乌托邦境遇里，或者主人公本身是一个投入乌托邦实践中的乌托邦主义者，代表作有苏童的《河岸》、格非的《人面桃花》等。女性成长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1970年代中后期生女性作家，代表作主要有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青春成长小说主要是1980年代及更晚期生作家写的以青春期、校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成长文本，韩寒、郭敬明、春树、张悦然等年轻作家迅速崛起，代替老一辈作家获得了读者的拥护，更成为中国新青年的国际代表³。

这一时期被誉为新启蒙，指的是文革结束、整个思想文化界重新举起了启蒙大旗，将个体重新拉回到关注的中心地位，反对集体主义式的盲从和极权。就中国成长小说而言，它的新启蒙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它的叙事模式。虽然同样是启蒙文本，也即以个体性为书写中心，新启蒙之区别五四启蒙，主要在于前者的现代主义维度。新启蒙的成长小说文本，类似于19世纪末起西方崛起的成长小说类型。它们不是描写“成功的”成长故事，而是“失败的”成长，而成长的主人公通常作为零余人、落伍者出现。这种特征尤其在后文革成长小说和乌托邦成长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类文本主要是为了反思历史，因而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被放置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经历各种异化。作者正是期望通过呈现主人公的异化和病态，来达到他们反思的目的。

第二，认同和读者获取途径。新启蒙成长小说文本的复兴，不是通过文革时期的官方控制，而是通过市场来获得读者认同。尤其是女性成长小说和青春成长小说，通过对网络、手机阅读等新媒体的占领，成为近十年最为畅销的小说类型之一。而以传统纸质媒介为传播渠道的后文革成长小说和乌托邦成长小说，也主要是通过提高故事性来参与市场，一些作品还在海外获奖，而不是依靠官方认同。

但新启蒙成长小说的意义还不在于此。它的意义在于通过特殊的书写方式，将“新启蒙”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层次。虽然自1978年起，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开始被称为新启蒙的时代，但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和自1989年起的新启蒙已经有了本质区别。中国成长小说自1989年起开始复兴，并不能说明它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可以认为，1989年事件开拓了一个新纪元，从此中国（成长）小说的书写已经不可能再采取乃至是1980年代的“先锋”姿势。此时复兴的成长小说用特殊的方式，破除了“新启蒙”作为一块整体的假象。

以对文革的反思为例。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老鬼的《血色黄昏》发表。这部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描写了主人公首先作为红卫兵主动下乡，后来被冤枉为“反革命”，被劳教十年的过程。作品一反文革时期成长小说的乌托邦式书写模式，用原始、粗粝的笔调，控诉了文革对个体造成的伤害。这部小说因其强烈的政治控诉和对一系列负面经验的真实描写，多次被出

³如春树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出版社拒绝，最后经过作者近十年的争取，小说才得以发表。讽刺的是，小说一经发表，它就以迅猛之势获得了官方和大众的认同，被当成了反思文革的代表作。这一现象主要还是应和了自上至下的文革反思浪潮。但是我们来看这部小说的反思性。小说以主人公“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获得平反而结局，主人公欣慰地想，从此首都知青慰问团发的毛巾、茶缸又有他的一份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反讽：主人公从未像最后这一时刻这样强烈地产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血色黄昏》之后，在整个1980年代，出现了大量文革记忆书写的文本。这些文本同样是以“反思文革”为旗帜，并获得了自官方至民间一致的认同，以获得重要官方奖项、入选重要选本、引起评论界和读者广泛讨论和关注等为途径，将自身定位在“新启蒙”这一位置上，承担起重构民族集体认同的重任。但是这些文本所提供的故事本身和它们宣称的目的之间出现了裂痕：主人公在文革结束时，要么平反获得了与受难之前平等的或更高的地位、收获了爱情，要么认为自己从苦难中学到了怎样生活，要么是认为受了伤，但找不到具体的敌人，总的来说，它们还是采取了“青春无悔”式的模式⁴。这种模式应和了大众的创伤心理机制，也即希望为过去赋予一种意义，从而才能继续现在的生活。但是这种模式却将历史反思批判维度消解了。陶东风认为，“这种悲壮青春叙事的核心，是从对‘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具体社会历史反思，转向对于知青一代被去政治化了的所谓‘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抽象道德赞美”[陶东风 2013]。如果极权式的存在最终也能带给主人公意义、让他“无悔”，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呢？从这个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新启蒙是有问题的。1980年代被称为“新启蒙”，从文学上来说，是官方直接干预文学创作的退场以及知识分子取代官方成为新的民间代言人、参与到集体意识建构中。相较于此前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从上述主流文革记忆文本的反思模式来看，这种进步可能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而可以认为，在新的形式下，官方与作家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共谋形式。知识分子的质疑精神被纳入官方的范围之内，毕竟反思文革、改革开放是在一系列官方纲领文献中提出的迫切任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张志扬将自救亡直至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表现的个人创伤，都看成是“国家观念”的“创伤记忆”。[张志扬 1999, 38-69] 而中国成长小说的新启蒙，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路径。同样是反思文革，中国后文革成长小说直接通过异化的成长形态，直面文革创伤带给个体的不可修复的灾难。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以一个对比结尾：主人公六六此时已长大成人，他的父亲对他坦诚，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怀着一个痛苦的秘密，就是他的情妇生了一个孩子，但他一直拒不承认孩子是他的。六六听了父亲的话，惊悚得脸都白了。因为困扰他父亲的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他。在与他父亲的情妇相好之后，对方怀孕了，并告诉他，这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也一直拒不承认。而与此同时，大院里面唯一的一个好孩子被误杀了。叶兆言解释说，这正是文革的最恐怖之处，文革将唯一的一个好东西给杀害了，但是孽子却活了下来，如今这个孽子正生机勃勃地在我们中间生活，成为这个社会的新主体。以叶兆言为代表，后文革成长小说将反思推进到这里，直接嘲弄了1980年代主流文革记忆书写那种似是而非的反思批判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1989年之后的成长小说书写开辟的新启蒙，真正将个体独立的质疑精神落到了实处。

巴赫金将小说话语分为“离心”和“向心”两种模式。如果说“向心”话语是“试图赋予本质混乱的世界以秩序”，“离心”话语则“解构这一秩序”[Morson 1990, 30]。中国成长小说的兴衰直接受制于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这一关系维度来看，中国成长小说是对巴赫金这两种话语模式的集中

⁴ 关于《血色黄昏》和1980年代主流文革记忆书写的论述，参考了许子东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青年文化心态：以〈血色黄昏〉为例》一文和专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

体现。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成长小说在1920年代末期诞生，因为直到此时在五四启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如茅盾、叶圣陶才开始进入社会主流力量的竞争舞台。《倪焕之》被看成是启蒙的第一枚果实。但是这枚果实却以失败而告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成长小说，以《倪焕之》为代表，不是作为“离心”，而是作为“向心”话语出现的，而它的失败，正好就根源于它对中国现代性的参与。它所承载的自由、平等维度，是从个人启蒙出发，作为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想象的一个方案而存在的。安敏成将这一倾向描述为：“叶圣陶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解决他那一代人面对的问题，即创造一种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自我” [Anderson 1990, 118]。只不过在多种“在场”力量角逐的过程中，这一努力丧失了话语权，从而走向了被压迫的位置。文革时期，中国成长小说一跃成为主流，它所提供的成长方式，为中国广大青年提供了“进入社会”的标准范式。文革的结束让人们开始普遍质疑这种“向心”结构。但是直到新启蒙开始后十年，也就是1989年，真正“离心”的叙事才开始兴起。新启蒙的“离心”叙事，以边缘者的位置，讲述个体充满问题的成长故事，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开始探索新的个体成长的可能性。一方面，它甚至已不像二十世纪初期的成长小说那样试图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紧密的关系，而是主动地保持自己的边缘者身份，另一方面它则通过进入市场，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形态。但是总的来说，从中国成长小说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力量对社会文化主导权的争夺状态，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单一性倾向。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无论是建构前后，始终只指向一个目标：独立、富强。因而启蒙式的人文关怀在这种要求中显得不合时宜，它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被压制，要么接受改造。中国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始终就在反抗和参与的角色中徘徊。1989年之后的新启蒙维度，将个体的声音释放了出来，它以尖锐之势，直接针对集体主义式的压迫性和异化。让我们看到了个人维度启蒙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以描写“失败”为核心的离心话语力量，究竟能走多远，还是一个未知数。苏童在《河岸》里只能暗示极权乌托邦对个体的压制状态，并用“维稳”这个词来描述了这种压制状态。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稳定重新成为问题的时候，中国成长小说的位置可能会再次变得敏感。

LITERATURE

Marston A.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Los Angeles, 1990.

Morson G. S.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Stanford, 1990.

茅盾。读《倪焕之》// *文学周报*, 1929, Vol. 8, Issue 20.

陶东风。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英雄叙事”。 [Electronic Resource]. - Mode of access: UR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2ebqv.html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1999.